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历 史 类

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 著
姚乃强 严维明 韩振荣 译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历 史 类

精
品
汉
译

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意] 杰奥瓦尼·阿锐基 著
姚乃强 严维明 韩振荣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意)
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1

ISBN 7-214-02867-0

I.漫... II.①阿...②姚... III.资本主义-发展
-研究 IV.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364 号

- 书 名 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著 者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
译 者 姚乃强 严维明 韩振荣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2
字 数 38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867-0/K·43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中文版序

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金融扩张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相反,自从世界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萌芽以后,金融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它是连续性的象征,因为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地发展以后,经常爆发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作出的典型反应就是金融扩张。然而,它也是突变的象征,因为一切金融扩张最终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使得它在新的领导下重新组织,恢复生机。没有几次这样的彻底重新组织,资本主义绝对不会成为今天千真万确的全球性现实。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目前的金融扩张与过去比较,独特之处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 and 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有三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秩序,它的基础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以其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称霸;以东亚地区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为主要基础的全球性秩序,这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哪个局面将成为事实,现在难以预料。我已经在本书的“结束语”里强调,本书的研究范围有限,使我不能比较明确地指出什么条件有利于某一局面。

本书完成后五年的今天,我依然坚信上述四点。有的读者可能认为第三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日本的经济危机持续不断,还演变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我并不这么认为,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我的论点是有历史前例可援证的。我和一本新书(Giovanni Arrighi, Beverly Silver et al,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999)的合著者,在该书中试图证明,新兴的世界性资本积累中心能领导世界、开创新秩序以前,必然成为动荡的中心,而不是扩张的中心。对于 18 世纪末的伦敦和英格兰这是正确的,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纽约和美国尤其如此。日本和东亚在 90 年代陷入了经济危机,但因此认为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不是正在从美国转移到东亚,犹如认为 1929—1931 年的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证明了这一中心不是正在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一样不合情理。

此外,以上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结合起来,不是要证明日本或者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准备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霸权,而是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或者导致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衰落中的霸权和它的盟友使用政治、军事力量颠倒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到东亚的转移,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反对东亚经济复兴说的人,忘记了日本和东亚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人口庞大,历史上在东亚地区举足轻重,这种持续的发展,对东亚经济复兴的重要性,比该地区内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减速和经济衰退要大得多。

中国的历史、地理位置特殊,其有利的形势使得它比别的国家更能争取到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力量。因此,我对本书的中译本比其他的译本更寄以厚望。即使这个中译本仅仅能对帮助中文读者了解世界经济有些微的帮助,我亦已喜出望外。

阿锐基

1999 年 5 月

前言与致谢

这本《漫长的 20 世纪》大约起步于 15 年前,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其他两个阶段是 1873—1896 年的大萧条与 1914—1945 年的三十年代危机。这三个阶段放在一起,把漫长的 20 世纪界定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纪元或阶段。

在我最初构思本书时,书的内容仅仅限于漫长的 20 世纪。当然,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美国体系的崛起只有跟英国体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但是,我感到没有必要,也无意退回到 19 世纪下叶之前起笔分析。

过了几年以后,我改变了主意,本书变成了所谓的“(现)代两个互相依存的主要进程:民族国家体系的创立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的专题研究(Tilly 1984:147)。这个转变是由 20 世纪 80 年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演变促成的。随着里根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金融化”,原先是 7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几个特点之一,变成了 80 年代危机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正如 80 年前英国体系消亡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观察家和研究者再次大声疾呼,称“金融资本”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高阶段。

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我在布罗代尔的三部曲《15 至 18 世

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三卷里发现了成为本书基础的阐释纲要。依照这个纲要,金融资本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它们是“旧”体制不断被摧毁,“新”体制同时被创建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根据这个发现,我把漫长的 20 世纪重新概括成由三个阶段组成:(1)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过程中,英国的“旧”体制的结构被摧毁了,美国的“新”体制的结构被创建了;(2)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质扩张阶段。在这期间,美国的“新”体制在贸易和生产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占据了优势;(3) 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更重要的是,在我从布罗代尔那里引申得来的解释方案中,漫长的 20 世纪现在看来是四个类似结构的漫长世纪中最近一个,每一个漫长的世纪都代表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我开始明白,在揭示有关当前危机的动因和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对这一系列漫长世纪所作的比较分析,其收益可能甚于单独对漫长的 20 世纪所作的深入分析。

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里,其结果是不得不把对漫长的 20 世纪的公开讨论的篇幅压缩到只约占本书的三分之一。不过,我还是决定保留本书原来的题目,以强调我涉足过去完全是作为一种策略。那就是说,重新论述以前几个世纪的金融扩张,惟一的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当前这次金融扩张的理解,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漫长的 20 世纪所涵盖的那个阶段的终结时期。

这样涉足过去,把我带到了世界历史分析的危險地带。蒂利

在评论我灵感来源的布罗代尔的巨著时,明智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在这个地带进行冒险的危险:

如果坚持是困扰思想狭隘者的妖魔的话,布罗代尔毫不费力地避开了这个魔鬼。当布罗代尔不用我们要求的一贯性来折磨我们时,他炫耀……迟疑不决。在三部曲的第二卷里,他反反复复地处理资本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但刚开始便转向,改变话题。……正因为话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回顾一下第三卷的内容就让你大吃一惊:第一卷里的重大题材——人口、食品、服装、技术——几乎全部销声匿迹!……我们还该从像布罗代尔那样脾气的人那里期望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呢?他处理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列出问题的各个元素,揣摩问题的微妙、矛盾和复杂之处。对照学者提出的种种理论,并给每一种理论公正的历史评价。把所有的理论放在一起就不成其为理论了!……如果布罗代尔办不到这事,谁还有此能耐?也许有人会写出一本“通史”,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欧洲国家体系成长的整个过程。至少在目前,把布罗代尔的巨著当作灵感的源泉,而不当作分析的典范,获益更大。要不是有一个布罗代尔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如此复杂的巨轮在到达遥远的彼岸之前注定要沉没。(Tilly 1984:70-1, 73-4)

蒂利建议我们在分析时应该先处理能操作的部分,而不是整个世界体系。他喜好的便于操作的部分是个别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如依附在国家身上的胁迫网络,以及依附在地区的生产方式上的交换网络。通过系统地比较这些组成部分,我们也许能够,“把对在具体的世界体系里的特殊结构和进程的说明,安放到有关那些世界体系的有历史根据的概括上。”(Tilly 1984:63, 74)

我在本书中找到了另一种出路,摆脱在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和

现代国与国之际体系的全面发展的困难。我没有跳下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分析的那艘巨轮,而是留在船上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虽然这些事跟船长的思想气质不相一致,却在我微弱的视力和哆嗦的双腿可及可到的范围之内。我让布罗代尔在世界史实的汹涌的大海上迎风破浪,而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很轻的任务,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

恰好,布罗代尔把金融扩张看做资本主义重大发展的结束阶段的观念,使我能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生命期(布罗代尔称作漫长时期)分成更能操作的分析单位,我把它们叫作“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虽然我把这些周期按照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命名(如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但是周期本身指的是体系的整体,而不是它的组成部分。书里比较的东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结构和进程。我们的焦点放在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策略和结构上,完全是由于它们在这些阶段形成过程中相继处于中心位置。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焦点。正如我在“绪论”中解释的那样,体系积累周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布罗代尔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本家”——的形成过程。多亏这个狭小的焦点,我能够在布罗代尔的世界资本主义概况里,添加一点逻辑一致性和增加几句话,就像让汽车多跑一些额外的里程,即布罗代尔结束其旅程的 1800 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但是缩小焦点也要付出代价。阶级斗争和世界经济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都几乎没有进入我们的画面,而这两者在我原先关于漫长的 20 世纪观念中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许读者会对这些和其他部分的省略迷惑不解,甚至惊愕。我对他们所能说的是,本书内容只是对漫长的 20 世纪诸多论述中

的一种,虽然它们不一定都密切相关,但是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在别的文章中曾集中论述漫长的 20 世纪的阶级斗争和核心一边缘关系(见 Arrighi 1990b)。在我写完本书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我很想把它们添补到我以前的解释中去。然而,我想改动之处却寥寥无几。就我能说的而言,那个论述仍然偏离它本身的视角。但是本书提供的论述,正如其副标题表明的那样,跟理解在形成我们时代过程中金钱与权力之间关系更密切相关。

为了把我按布罗代尔巨轮模型建造的小船送到 20 世纪后期的彼岸,我不得不立誓避开我访问和袭击过的专业知识岛屿上所掀起的辩论和论战。像迈耶(Arno Mayer 1981:X)一样,“我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热心的‘堆合者’和建筑师,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分裂者’和破坏者。”也像他一样,我请求的是“‘耐心聆听’,把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和判断’,而不是断章取义。”

写一本有关漫长的 20 世纪的书的主意不是我的,而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我写过几篇篇幅略长的关于 7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论文。在对其中一篇激烈的讨论之后,早在 1981 年他就说服我,只有写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才是充分表达我思考的那些内容的合适途径。最后,他时刻注视着我在那些世纪里游荡,经常告诫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如果安德森是我卷入这个过于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的主要教唆犯的话,那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使得这个计划比原来的更为雄心勃勃的主要教唆犯。把写作的时间跨度扩展到涵盖布罗代尔称之为“漫长时期”时,我实际上在步他的后尘。我们每天在布罗代尔中心一起工作时,他总认为我的漫长的 20 世纪中所表达的倾向和推测,也许反映了自 16 世纪以来一直在合适位置上的结构与进程。他的观点让人坐立不安,迫使我去检查自己论述的可靠性。在我检查时,我看到了跟他所见不同的事物,即使在我看到同样的事物时,我对它们的处理与应用跟他在《现代世界体

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做的迥然不同。但是,当他坚持认为历史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是我思考的那种内容的合适的时间框架,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他思想上的激励和挑战,我甚至不会想到要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本书。

在构思这样一本书和实际撰写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要不是我有幸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15年里跟一批杰出的研究生一起工作,我是不可能弥合这条鸿沟的。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些人有意无意给我提供了组成本书内容的绝大多数问题和许多答案。他们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巨人,我就是踩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故而,我不能不把本书呈献给他们。

作为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研究生教学计划的总策划人,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对把宾厄姆顿分校变成我写作此书的最佳地点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对我使用的方法也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帮助。作为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西尔弗(Beverly Silver)对完成本书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没有她思想上的指导,我可能会走上歧途;没有她道义上的支持,我可能会凑合了事。

1989年9月在坎布里奇的伊曼纽尔学院举行的第二届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关于西方结构变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本书第一章的最初文本,接着将它发表在《评论》(Review)季刊上(1990年夏),并在吉尔出版社重印(Gill 1993)。第二、三章里的有些部分宣读于1990年9月在伊曼纽尔学院举行的同一主题的第三届学术会议上。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代表,以及在1988年9月举行的前一届会议的代表,都逐一给我的船添薪加油,要不然我的船也许已经沉入海底。我非常感激哈利戴(Fred Halliday)和曼(Michael Mann)邀请我参加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一系列会议,感激霍布森(John Hobson)成功地组织了这次会议,感激所有其他与会者,使我们的讨论富有启迪性。

安德森, Gopal Balakrishnan, 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 霍普金斯, Resat Kasaba, Ravi Pala, Thomas Reifer, 西尔弗, 沃勒斯坦在最后的校样出来前, 阅读和评论了原稿。他们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极大地帮助了我修补这个富有冒险性事业产品中可以修补的地方。雷弗(Thomas Reifer)也帮助我对本书中的参考资料和引文作了最后的校对。绝非客套, 而是实事求是, 我对于一切没有来得及修订或校对出来的谬误负全部的责任。

最后, 我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安德烈(Andrea)。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时, 他准备进入高中。在写完最后一稿时, 他已经在米兰的斯塔特尔大学获得哲学考试优秀奖。确实, 他总是令我自豪的儿子。不过, 当这部著作将要结束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位难能可贵的编辑顾问。如果本书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之外还有读者的话, 不能不归功于他。

阿锐基

1994 年 3 月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与致谢·····	4
绪 论·····	1
第一章 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霸权 ·····	32
霸权、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32
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 ·····	43
英国霸权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	56
美国霸权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兴起 ·····	70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	89
第二章 资本的崛起·····	101
体系积累周期的背景·····	101
巨额融资的形成·····	115
第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130
第二(荷兰)体系积累周期·····	151
国家和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171
第三章 工业、帝国、“无限的”资本积累·····	190
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	190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一)·····	208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二)·····	233
回顾和预述·····	256

第四章 漫长的 20 世纪	285
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	285
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	319
全球危机的动力	355
结束语 资本主义成功后,能继续下去吗?	383
图表	420
参考书目	438

绪 论

在过去的 25 年中,一些基本的东西似乎以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人谈论危机。80 年代,大多数人谈论重建和改组。90 年代,我们不再相信 70 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我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历史确实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但是情况不像乍一看来那么严重。长期的危机、重建与改组,简而言之,长期断断续续的变化,比起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沿着一条确定的发展路线出现的那种短时间的普遍扩张来说,更具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的特点。过去,这些长时间的断续变化,总是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新的和扩大的基础上的重建而告终。我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可能发生新的一次这类重建的体系条件,并探讨如果新的重建果真发生,它会是什么样子。

1970 年左右以来发生的变化,显示资本主义在局部地区和全世界运转良好;这些变化一直受到广泛的注意,虽然它们的确切性质仍然众说不一。但是,这些变化极其重要,成为越来越多文献的共同主题。

资本积累过程的空间架构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的趋势似乎是,资本积累过程从高收入地区和国家向低收入地区和国家重新分布(Fröbel, Heinrichs and Kreye 1980; Blue-

stone and Harrison 1982; Massey 1984; Walton 1985)。而在 80 年代,主要的趋势似乎是资本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Gordon 1988)。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运动,1970 年以来的趋势一直是,资本的地理流动性愈来愈大(Sassen 1988; Scott 1988; Storper and Walker 1989)。

这种趋势与组织生产和交换过程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某些作者宣称,“福特式”大批量生产的危机,为恢复“灵活的专业化”制度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福特式”大批量生产是建立在专门化机器体系的基础之上,并在纵向合并、实行官僚管理的大公司的组织领域之内进行的;而“灵活的专业化”则是建立在小批量手工艺生产的基础之上,由市场般的交换过程协调的中、小企业来完成的(Piore and Sable 1984; Sable and Zeitlin 1991)。另外一些作者关注收入—产生活的法律调节,注意经济生活的日趋“形式化”(即对组织生产和交换过程增多法律限制)如何引起朝“非形式化”的反趋势(即增多通过这种或那种“个人”或“家庭”的企业主义来避开法律调节的收入—产生活动)。(Lomnitz 1988; Portes, Castells and Benton 1989; Feige 1990; Porte 1994)

许多研究报告与本书有些部分重叠,它们都追随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把当前资本主义经营模式中的变化解释成他们称之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构危机(要了解详情,参阅 Boyer 1990; Jessop 1990; Tickell and Peck 1992)。这种体制被概念化为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特点是投资固定资本,为生产力和大众消费的正常增长创造潜力。为了实现这种潜力,适当的政府政策和措施、社会机构、行为准则和习惯(“调节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凯恩斯主义”被说成是能使形成中的福特主义体制充分实现其潜力的调节方式。反过来,这又被认为是 20 世纪 70 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Aglietta 1979; De Vroey 1984; Lipietz 1987; 1988)。